

● 翻译研究

从柯大卫英译《四书》“点评”
看新教传教士之“译儒攻儒”

邓联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 410004;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3)

提 要: 出于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儒家圣人和儒家作品普遍持有偏见。《四书》译者柯大卫在该书英译本的大量“点评”中批判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其主要攻击点有:中国人的偶像崇拜与祖先崇拜、儒家“人可凭借自身努力达到至善境界”的观点、中国人爱撒谎、不诚实的品性。译者通过这些“点评”,借助翻译儒家作品攻击儒家学说。当今,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时,传教士英译儒典的观点值得我们反思。

关键词: 柯大卫 《四书》; 翻译; 点评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2-0090-6

**Translate to Vilify: Comments on David Collie's "Remarks"
in Hi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Four Books***

Deng Lian-jia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Qing 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China had serious bias against Confucian sages and Confucian works. David Collie, as translator of the Four Books, gives heavy attacks on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ulture via the "remarks" in the English version. His major attacking targets include: (1) the wide-spread idolatry and ancestor worship among the Chinese; (2) the Confucian notion that "a man can achieve supreme goodness through his own effort"; and (3) the Chinese people's dishonest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translator attains his goal of attacking Confucianism by adding "remarks" to the English version.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outside world, we have to reflect upon the Protestants' transl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Key words: David Collie; Four Books; translation; "remarks"

1 柯大卫眼中的儒圣与儒学

与同期其他西方传教士一样,柯大卫借以观察中国的眼睛镶嵌着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化这两块有色镜片。他在解读和翻译孔子、孟子等中国圣人作品时带着强烈的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优越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观察、评判其中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乃至中国的整个文化体系,进行许多带有强烈偏见、充满语言暴力的负面评论。

柯大卫利用译本“前言”和“孔子生平”、“孟子生平”等3个文本,评价儒家的第一、二号圣人以及儒家最重要的4部经典。评论时,他的两块有色镜

片,特别是基督教那块镜片从来没有摘下过。

在讨论中国第一圣人孔子的著作和学说时,柯大卫评价道:“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我们未发现任何一个观点超出惯于思考的普通人的能力所及。对于那些我们认为绝对必须仰仗上天启示才能深入发展的最重要问题,孔子完全没有提及;关于上帝的本性及其统制,他论述甚少;关于来世,他几乎不着一字;关于这个有罪的世界如何恢复到上帝所希冀的模样,其观点无不与正常的理念和神启的真理相左;关于上帝以及人对于造物主责任的诸多主题,他的知识似乎远不及希腊先哲,

特别是苏格拉底;情况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苏格拉底生长之地与天启之光首先照亮的国度更为接近……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现今那些徒有其表的孔子追随者们已经陷入绝对的无神论之中”(Collie 1828: vii)。关于孟子,柯大卫认为他跟孔子一样,只能在讨论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时表现出一定优势,而一旦涉及形而上的关键领域,往往是迷失难返(Collie 1828: v)。对于《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他的点评最后总是充满极具基督教色彩的否定性结论。

柯大卫对儒家学说的总体评价是“儒学系统包含着一些不言自明的、合理而实用的真言,也夹杂着许多深奥难懂、空洞浮夸且十分危险的学说”(Collie 1828: Part II: 10)。这一看似“客观”的评价,其实并未跨出基督徒评判异质文化的框架。须要指出,柯大卫对儒圣和儒学的这些认识,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翻译行为。

2 柯大卫英译《四书》动机

新教传教士英译儒家典籍“并非因为信服儒家之道”,其最终目的是为更好地传播基督教“福音”服务”(王辉 2011)。实际上,新教传教士的某些儒典英译起初仅仅是作为学习中文的一种翻译练习。如马希曼英译《论语》、马礼逊英译《大学》、柯大卫英译《四书》等都源自学习中文这一初衷,而非出于热爱儒典。从众多书评和翻译副文本看,新教传教士非但称不上热爱儒家经典,反而普遍对它们持有否定态度。“即便是那少数几位对孔子持有好感的传教士,对其前辈将上帝的启示与孔子的说教相提并论的做法也颇感愤怒。”(Miller 1974: 64)但是他们无法忽视儒家典籍的现实影响,因为他们来到中国后发现,正如基督教渗透在西方文明的各方面一样,《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对中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影响深远。儒学的这种影响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天然障碍,新教传教士不得不详加了解,以便在此基础上摧毁中国人的思想根基,并用基督教取而代之。柯大卫在产生出版其《四书》初译本的想法后,给译本增添了大量攻击、批驳儒家学说和中国习俗的“点评”,柯氏译本的这一变化很好地印证了传教士“译儒攻儒”的动机。

柯大卫在《四书》英译本“前言”中对其翻译目的的解释是:翻译该书最初只不过是“为了获得一些汉语知识”而练笔,待译本完成后,才发现

译本在英华书院的教学功用。不过须要认真修改译本,配以权威评注,并偶尔评论书中信仰与道德方面的原则错误,这样才能有助于学生学习英文,特别是启发学生严肃思考中国圣贤观念中的“致命错误”。关于公开出版该译本,柯大卫心中至少装有两类目标读者:一是那些刚刚开始学习中文却没有教师帮助的人;二是那些喜爱探讨不同民族思维运作方式的人。柯大卫觉得《四书》“可以作为很好的标本来了解作者所处年代与环境中的人们,他们在信仰和道德方面能达到何种水平”(Collie 1828: i-vi)。译者通过下面这段话暗示孔孟时期中国人信仰与道德水平的低下:“他们(在信仰和道德方面)的成就,我们留待读者阅读以下几页后自行判断。我只想说明,有着信仰和道德追求的基督徒将会有充分理由庆幸自己学到了‘一种更好的方式’”(Collie 1828: ii)。柯大卫公开出版《四书》译本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昭然若揭:使其读者认识中国圣人和普通百姓在信仰和道德方面与基督教信仰者之间的巨大差距。

3 译者“点评”对中国文化的攻击

如果说柯大卫在《四书》英译本“前言”以及“孔子生平”、“孟子生平”等处对儒学的整体负面评价是全面性空中打击,那么他在脚注中运用“点评”对儒家思想与学说的零星否定就犹如局部性地面进攻。

柯大卫在其《四书》译本“前言”中曾提及在翻译练笔基础上增加“注释”和“点评”的目的,那便是对书中信仰与道德方面的原则性错误加以评论,借以启发学生认真思考“中国圣贤观念中的致命错误”(Collie 1828: i)。下表是柯译《四书》各类“点评”的总体情况。

类别	特点	数量	总计
批评性	根据基督教教义批驳儒圣言论;否定书中所述观点和现象	62	
评论性	客观点评儒圣言论以及书中所述观点和现象	27	107
注释性	解释儒家核心概念及个别章句含义	18	

上表清楚地显示柯大卫撰写“点评”的出发点:除了像一般译者对所译内容在关键处进行必要的注释外,他还对文中重要观点和现象作出自己的解读,甚至对中国圣贤做出批评。书中所述言论和行为只要其所据义理不与基督教义相违,他一般会客观介绍。即使存在问题,也往往从轻发落。但是,对那些义理有违基督教义的言行,特

别是当涉及道德准则与信仰问题时,译者会随时做出批驳。

总体上看,在柯译《四书》的一百多条“点评”中,除了一些对儒家核心概念和个别章句涵义进行探讨的注释性“点评”和少量确为客观公正的评论外,主要的点评内容均为译者从基督教教义出发对异质文化所做的批评与否定。

通过对其“点评”内容的观察我们发现,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儒学系统和儒圣言行中与基督教教义存在矛盾与冲突的道德准则与信仰。《四书》英译本首条“点评”其矛头所指便是这一方面的内容,该条点评针对的是朱熹《大学章句》中的一个注解:“这段文字看上去说理很是漂亮,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真理,但其体系在根基上存在着重大谬误。那就是:拥有对世间事物广博而精深的知识便可使人净其心,端其行。我们无需对这一重要问题做理论推测,因为人类历史上无数事例说明:许多极其出色地掌握着广博自然知识的人,其道德行为根本不能为人典范。这就说明,无论多么渊博的知识,都不足以产生道德革新的效果。它还有力地证实了一个上天启示——只有正确地了解造物之主和救世之主,并借助神圣之灵的力量重拾心灵活力,才能达到心灵的纯净、意旨的专一和行为的正直。这才是纯粹的永世幸福的前提和基础”(Collie 1828: Part I: 1)。

从这条出现在《大学》译本首页的“点评”,我们可以大致窥见柯大卫撰写“批评性”点评的基本思路:在儒典章句、语汇中发现有违我教的言论和行为叙述,(有时)肯定其部分正确性,然后祭出基督教的神示、教义、准则,指出儒家信仰和道德准则的谬误,最后根据基督教精神指出一条“康庄大道”。译本中的62条批评性“点评”基本上都沿着这一思路,只不过攻击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出击的力度也有差异。“点评”批评的对象广泛,涉及儒家学说、儒圣行为、执政理念与民间生活的诸多方面。从它们的打击对象和攻击火力来看,其攻击频次最高、攻击力度最大的主要是以下3个方面。

3.1 因缺乏上帝观念所致的偶像与祖先崇拜

柯译《四书》“点评”中频频出现的一个批评对象是中国人的偶像崇拜与祖先崇拜,全书这一类点评约有20余条。对于中国人以“只有上帝才配得上”的虔诚礼仪对待圣人和先祖,柯大卫不断挥舞批评武器,指出中国圣人在美德、能力和影响方面的巨大差距,或明示、或暗示地引导读者对孰优孰劣做出“正确”的判断。

在译本《中庸》篇第三十章的一处“点评”中,柯大卫说“人们从这些言论中差不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的崇拜者认为,孔子比神的德行影响更加广泛。正因如此,中国人至今仍将神圣的荣耀给予这位心存脆弱、并非完美的有罪之人,也就不足为怪。如能稍微知悉诸如先知以赛亚所获得的那种神圣的荣耀与庄严,那么,他们一想到将宗教般的敬仰给予凡人,便会不寒而栗。因为即使是人世间最具卓越美德之人,与至高的上帝比起来,也只不过尘埃中脆弱肮脏的蠕虫罢了”(Collie 1828: Part II: 27)。

在这一类译者点评中,柯大卫充分运用基督教话语,指出上帝的至高无上、至真至纯、完美无缺和荣耀无限以及中国圣人与之相比较而言的渺小平凡,让读者自然得出结论:中国人心中全然没有上帝,而把本应付予上帝的爱与崇敬付予了圣人、先祖和父母,这种做法是极其荒谬可笑的。译者频繁使用“上帝”(God)、“至高者”(Supreme Being)、“天父”(Father)、“造物主”(the Creator)、“救世主”(the Savior)、“至上统治者”(the High Ruler)等词汇和“启示”(revelation)、“拯救”(save, salvation)等大量基督教语汇,使其“点评”乃至整个译本弥漫着基督教气息。

柯大卫的言行与当时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传教士入华之前就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来华之后的亲身经历更让他们切身体会到这一“异教”国家的黑暗与落后。如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福音,首先便要揭示中国人心中完全没有上帝这一现实,揭示其以偶像崇拜与祖先崇拜代替上帝崇拜的荒唐之处。在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典籍之中找到这种证据,指出其荒谬性与危害性,无疑是最为有效的。

3.2 人可凭借自身努力达到至善境界

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而且这种原罪是靠人类自己的努力无法摆脱的,只有全能的救世主上帝才能帮人赎回原罪,得到拯救。依照基督教这套思维模式,《四书》里中国圣贤“人生而有德大智”、“人可以凭借自身努力达到至善境界”的系列言论自然是根本错误的。例如,在《中庸》第十三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一句及其注解中,柯大卫隐约发现中国人的一个错误观念——学而可达于至善,并严厉批驳:“这一观念似乎是基于这样一条中国式义理:即使是处于堕落状态的人也保留着一些神圣的信念,这些信念使得他通过长期的学习和自律达到智慧和美德的最大提升。然而,只要对那些最著名的古代异教

哲学家的经历稍有了解,便会明白这只不过是美梦一个。它既有违圣神天启,也不符合事实。古希腊不是也有很多哲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吗?他们求诸于己,求诸于人,也求诸于自然万物。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研究其著作的人都认为他们并未找到令人满意的真理。既然穷其终生追寻真理的人都未达到目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像中国圣人一样认为人人能接近真理,甚至内心已有真理?这一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人并非生而掌握真理,而是来自上天?”(Collie 1828: Part II: 9)。

柯大卫在“点评”中对此类“谬误”言论的批评有十余处。特别是在极力主张性善论的《孟子》篇中,这类批判性点评最为频繁。

实际上,柯大卫对以上两个方面的批评,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人未将上帝视为智慧与美德的唯一源泉。无论是认为人生而有智慧与美德还是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至善境界,都否定上帝是至善的唯一源泉,都是因为缺乏基督教知识以及对造物主上帝没有基本了解所致。柯大卫认为,中国圣人因心中没有上帝而把自己视为拥有至高智慧和美德的人,从而导致他们在言论和行为方面的系统性、原则性错误。

3.3 爱撒谎 不诚实

诚信是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撒谎的舌”是耶和華所恨恶的6样东西之一,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例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利未记 19: 11 节),“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诗篇 101: 7 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華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箴言 12: 22 节),等等。在基督徒眼里,神诚实正直,人说谎就是违背神的性情。因为神诚实正直,人互相欺骗就是冒犯神。而且谎言就是谎言,并没有善、恶之分,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成为撒谎的理由。在不想说真话的时候,“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箴言 17: 28 节)。

《四书》记述一些圣贤出于善意而撒谎的情况,如《论语·阳货第十七》十九章中儒悲拜访孔子时孔子的称病,《论语·雍也第六》十三章中孟之反出于谦虚的谎言,《孟子公孙丑下》第二章中齐王和孟子的谎称生病等,这些自然难以逃过柯大卫的眼睛。即使明确地知晓撒谎者的善意,他还是从基督教的教义出发认为这种行为“让人唾弃”(Collie 1828: Part III: 23),是“无耻的谎言”(Collie 1828: Part III: 86)和“丑恶的污点”(Collie 1828: Part IV: 51)。《论语·雍也第六》十三章中

孔子表达对鲁国大夫孟之反勇猛、谦虚性格的欣赏。在部队败退时他敢于殿后,快进城门时他谦虚地策马对众人说,“并非我敢于殿后,而是马跑得不快啊”。对于孟之反的这一行为,柯大卫的评价是:“这位战士为了显示自己的谦虚违反了说实话的原则。他直接撒下一个谎言,这在诚实的上帝面前称得上是严重的罪行。他的谦虚值得仿效,然而其不尊重事实的做法须让人唾弃”(Collie 1828: Part III: 23)。不难看出,对于儒典中的这种善意说谎行为,柯大卫并未心怀对说谎者的理解与同情,更没有将其与《圣经》中用谎言挽救两个探子生命的妓女喇合(《约书亚记》第二章)相提并论,而是直接加以否定。

除了说谎行为,基督教还认为,夸大事实的吹牛也属说谎性质。对《四书》中“夸大”儒圣和明君仁义美德的描述,柯大卫也不轻易放过,而是反复声称有关文字言过其实。他认为,“治国如治家”和“上行则下效”的观点都很有道理,但均属“把好的准则抬得过高”(Collie 1828: Part I: 9)。他还认为,“君王德行决定着国家的治理乃至百姓的品行”的观点虽有其合理之处,但被夸得太过(Collie 1828: Part II: 16)。孔子倡导依靠理性与德行治理国家,并认为如果君子有德,小人也会仿效他们而变得有德。柯大卫认为,这些理念本身很好,但被中国圣人及其追随者发挥太多。在柯大卫看来,《四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夸大其辞”跟撒谎并无多大差别,因此遭到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批驳。

须要指出的是,柯大卫的“点评”并非全都是对《四书》乃至中国文化的批评与攻击。诚如上文提到的,全书 107 条“点评”中有 27 条属于客观公正的评论,其中有少部分还是非常肯定的评价。如对《论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句以及张敬夫的注解“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乐,则是好之未至也”等内容,柯大卫做出了罕见的正面评价:“这些话完全正确,而且非常符合上帝神旨。如对神启原则理解是肤浅的,便不会让人产生对它们的热爱;如对神启原则有些热爱和部分称许,则不会有对其中真理的挚爱;如果在心灵上清晰地理解了神圣真理,则肯定会热爱它,而且会让人产生最纯洁、最神圣的喜爱”(Collie 1828: Part III: 24)。

不难看出,译本中出现这种肯定评价多是因为译者发现了原文观点与基督教义的相符,不具基督教色彩的肯定性“点评”全书仅见一处。

4 新教传教士的译儒攻儒策略

柯大卫《孟子》译本中借“点评”攻击、诋毁中国圣人言论和中国文化的做法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译者普遍采用的“译儒攻儒”策略的一个典型代表。马希曼、马礼逊、裨治文等从事过儒家著作英译的传教士,无一人不运用语言暴力,借助其前言、注解和译评等各种翻译副文本攻击儒家思想学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是像麦都思这种对所译作品《书经》充满好感、对中国古代文化十分仰慕的传教士译者,也在其译本前言中指出了《书经》的“缺陷”——该书未涉及宗教信仰(Medhurst 1846: viii)。不仅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如此,他们翻译的《三字经》、《千字文》、《小学》这类儒家读物中也充斥着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负面评论。例如,在传教士裨治文眼里体现着儒家思想的《三字经》等读物是极为浅薄的。《小学》作为中国教育的根基是“不完备、不牢固”的;中国古代先贤虽然留下了许多可以全盘接受的知识,但这些先贤们自己都“从未达到过知识的起点水平,浑然不知对上帝的敬畏”,自然也就不会把关于上帝的知识融入其教学之中。“仅是这一事实便造成了他们所有伦理体系的巨大缺陷。他们口头上谈论智慧、真理、公正、慈善等,而在行动中这些美德最后仅停留在形式和仪式上……所有的罪恶可能会存而不察,积百成千,直至变得凶猛而不可治愈”(Bridgman 1836: 87)。

这批传教士译者大多在其译本的前言或其他翻译副文本中声称其翻译的忠实性,他们须要通过介绍“真实”的中国文化信息以纠正此前耶稣会士等通过对中国儒家学说的不实描述和过分赞誉所塑造的错误中国形象,他们要将自己心目中“不过尔尔”的儒家典籍“原样”呈现给西方读者以获取国内对其传教事业的信心与支持。韦努蒂曾宣称,居于霸权地位的英美等国,其译者在翻译其他弱势民族文化作品时往往采取归化手段(Venuti 1995)。柯大卫的《四书》译本“本文”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反例,但是,诚如王辉在分析马礼逊直译《大学》时所指出的,“‘直译’也可以是矮化东方、为殖民主义张目的工具”(王辉 2007)。在翻译策略上与“本文”部分最低限度的操控形成对照的是,这些译者在其翻译副文本中大量运用操控手段进行知识管理。因其文化优越感、传教士心态和视儒学为传教天敌的态度而生的对儒家典籍的普遍偏见和粗暴态度在副文本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本来,“译者应当永远努力去遵循圣人的恕道——也就是一种对于语言与

人民的真正他性的富有情感的考量关照”(吉瑞德 2011)。这批传教士显然背离了这一原则,他们不是对所译作品努力做必要的善意解读,而是从基督教视角出发,频频运用语言暴力,对儒家学说和理念横加指责,滥作诋毁,“传教士帝国主义”在这批传教士儒典翻译的副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如果说耶稣会士的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美化与神秘化,那么,新教传教士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英译儒典不仅揭开了耶稣会士为儒教中国所蒙上的神秘面纱,而且还恣意运用语言暴力,极力歪解、诋毁中国文化,制造了一个文化低劣、亟需拯救的中国形象。这一做法配以译者们反复声称的“忠实”、“直译”,无疑使这一负面中国形象的可信度大大提高,而这可能正是传教士译者所期待的效果。

5 余论

《四书》译本中的百余条“点评”均为译者在原文本以外添加的内容,是作为诠释者的他对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儒家著作的解读、解构乃至重构,译者的这种高度显身是对译本内容所做的一种“知识管理”。在中西文化交流具有明显单向性的时代,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几乎完全缺席这种译介活动,这无疑强化了这种知识管理的作用。加之译者作为“掌握真理的权柄”的基督教徒所持的那种权威姿态和道德制高点,可以想象西方读者在面对这样一个译本时对其“点评”的全面信从。新教传教士通过其译著作品,并借由本质化解读所形塑的负面中国形象是美国在19世纪形成负面中国形象的最主要根源,也是19世纪末西方“黄祸论”和美国《排华法案》的意识根源。因为,与外交官和商人译著者相比,传教士“在美国拥有最多的读者”(Miller 1974: 57)。可以说,新教传教士对中国阴暗面的夸大宣传正是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肇端。其实,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已洞见传教士英译儒典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宣传效果,于是博学鸿儒辜鸿铭用其儒典英译进行文化抗争,“让西方人认识‘真正’的中国文明,改变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王辉 2007)。此后也有不少中国本土或海外华人译者继续这样的努力,或多或少地抵消了传教士所形塑的儒学负面形象。

萨伊德曾在其《东方学》扉页中引用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显然适用于晚清中国被早期新教传教士译介的情

形。在中国完全没有表达意愿、完全缺乏表达能力、表述者和被表述者几乎没有沟通机会的语境下,只能任由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表述者根据其自身的意图和能力进行表述。对于西方传教士对自己文化的不敬、扭曲和误读,当时的中国人无力还击,甚至一无所知。这一事实对今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的梦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华文化的“走出去”需要输出方的有效介入,以免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特质在传译过程中遭受太多不必要的损耗和失真。关于这一点,我国近年的实际做法可圈可点。如有关“中华学术外译”的工程,大批一流知识精英参与其中,出现在传教士译本里的那种文化损耗和失真再也不会大规模重现。

从文化交流角度看,因这批传教士持有强烈的译入语文化优越感和对译出语文化的轻蔑与敌对态度,从而导致其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败。这说明在翻译活动中对异质文化理解与同情的重要性。同理推之,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行动也须要建立在译入语文化的理解与同情之上。如果不理解译入语文化的特质,不考虑译本能否与其本土文化接上地气,不考虑译本是否可能对译入语本土文化产生“休克”效果,而是一厢情愿地将自认为优秀的文化内容强行推介,就很有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在中外文化贸易出现严重逆差、中国提高“软实力”的努力遭受一定程度的挫折时,许多有识之士对此做出了很有价值的善意提醒。如英国48家集团主席麦启安(Alistair Michie)认为,中国必须用更加有效的方法对外沟通。他说,“你要和你的听众、受众进行互动,你要了解他们要了解什么,需要什么”(麦启安2013)。

参考文献

- 吉瑞德. 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中文版序言)[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季红琴. 《孟子》及其英译[J]. 外语学刊, 2011(1).
- 刘单平. 《孟子》三种英译本比较研究[D]. 山东大学, 2011.

- 麦启安. 在2013博鳌亚洲论坛“对话赵启正”环节中的谈话[OL]. [http://finance. people. com. cn/n/2013/0407/c1004-21045399. html](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407/c1004-21045399.html).
- 赵长江. 译儒攻儒,传播福音——“四书”的第一个英译本评析[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5).
- 王辉.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1).
- 王辉. 叶拉美. “直译”的政治: 马礼逊《大学》译本析论[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5(3).
- 王辉. 新教传教士译者对孔子和儒家经典的认识[J]. 孔子研究, 2011(5).
- 杨颖育. 百年《孟子》英译研究综述[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2010(5).
- Collie, D.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 [M]. Malacca: The Mission Press, 1828.
- Bridgman, E. C.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Its form, Size, Author, Object, and Style;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The Work Adapted to the Purposes of Primary Education [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5a.
- Bridgman, E. C. Tseen Tsze Wan, or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ts Form, Size, Object, Style, and Author;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New Books Needed for Primary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5b.
- Bridgman, E. C. Seaou Heo, or Primary Lessons: Character and Object of the Work; Tabular View of Its Several Divisions; A Translation of First Part, with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6.
- Medhurst, W. H. *Ancient China. 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llustrated by Later Commentators* [M].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6.
- Miller, S. C.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1882*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收稿日期: 2013-12-13

【责任编辑 王松鹤】